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3) 下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

今天的美国是世界超极大国之一，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影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而 200 年前在北美大陆却根本不存在美国这个国家。那么，美国是怎样形成的呢？

美洲的发现是纯属偶然性的。欧洲的商人本来是利用陆路从东方运丝绸、香料来供应文艺复兴时代的宫廷，但在 15 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封锁了这一通道。为恢复贸易，欧洲人开始寻求一条通往东方亚洲大陆的通道，以避免封锁。而意大利的哥伦布则认为他能向西横穿大西洋直抵东方，在西班牙支持下他开始了他的壮举。

1492 年 10 月 12 日，哥伦布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而发现了美洲这块新大陆。

随后，西班牙产生了向新大陆移民的想法，并在 1565 年建立了圣奥古斯丁，墨西哥以北的第一个永久居民点。西班牙还在佛罗里达及沿东南海岸建立了一连串筑有堡垒的传教区，以保住它所谓的新西班牙的领土所有权。

不久，法国人也来了，探索了圣劳伦斯河与五大湖，宣布占有东北的一块土地，称之为新法兰西。1605 年，在新斯科舍的罗亚尔港建立了一个永久居民点。

英国人来的比较晚，但发展很快，颇有后来而居上之势。

由于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水平，所以英国决定在广大的北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便能到海外掠夺工业原料，开辟国外市场。为达到这个目标，英国成立了一些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其中，一些大商人、资本家成立了“伦敦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并从英王那里得到“特许状”，取得了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特权。1607 年 5 月，伦敦公司派出一支殖民队在北美东海岸登陆，建立了第一座城市詹姆斯敦，后来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弗吉尼亚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

13 年后，一批在英国受到宗教压迫的不信奉国教者，乘坐“五月花”号船启航到美洲以逃避迫害。他们到了马萨诸塞海岸。这些移民知道自己处于法律管辖之外，并且入侵了他们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于是在登陆之前简明地约定一个协议，结成一个“平民政治团体”，而制订“我们全体保证尊重和遵守的”法律。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正如它所规定的那样，把教会誓约的原则用于这个独特的民事问题。后来的拓荒者一旦向西移动，离开法治社会的范围时，就把这一协议作为临时自治的基础。

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后，英国人在它的北面也建立了一系列的据点。它分布在卡斯科湾到波士顿港的海岸线上。一群有钱的清教徒与商人注意到这一大片的殖民地。为接管并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教会的联合企业，他们组织了马萨诸塞湾公司，得到英王颁发的“特许状”。

1630 年，清教徒约翰·温斯洛普带领 1000 多名移民来到马萨诸塞，建立了波士顿镇，不到二年的时间，马萨诸塞殖民地就得到了巩固发展。在此后又有 2 万多名新移民前来马萨诸塞殖民地。到了 1635 年聚居于波士顿周围各个镇上的人已很多了；波士顿总督的专制统治也令人感到愤慨；再加上此地土壤不适宜于农业生产，而欲改行养牛，但波士顿的土地有限，无法建立牧场；因而人们开始一小批一小批地向内地迁移，而建立了一些新的殖民地，像康涅狄格、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

由于商业公司冒风险太大，后来的殖民地是由有钱的领主建立的，他们或是有钱有势的大贵族，或是皇室的宠儿，为通过开发遥远的那块旷野来发财致富，而要求英王把北美洲的大片土地封赐给他们作“领地”，由他们招徕移民去垦殖。

1634年，卡尔弗特勋爵得到了马里兰地区，从而建立了马里兰州。这个州不久成为生产烟草的地区。

国王查尔斯二世在1663年把弗吉尼亚以南的广大地区分给了八个廷臣，建立了卡罗来纳。在1691年卡罗来纳分成南北两部分，直到1712年这两部分才成为独立的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两个殖民地。

1635年，英国占领了荷兰在哈得孙河建立的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作纽约。1676年其南部被划分为东、西泽西州（1702年合并作新泽西州）。

1681年，国教左派教徒威廉·佩恩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的领主。1682年约克公爵把特拉华三个县转让给佩恩，这三个县在1701年获得当地自治权，但宾夕法尼亚仍对这些“低一级的县”保留最后权威。1775年特拉华宣布它应同其他殖民地平等，经过争取在1776年被宣布为州。

随着北美大陆上英国殖民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大量的移民也拥入殖民地。17世纪初的查理一世专制统治政治迫害使大批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流亡海外；1649年到1660年清教徒统治时期，也有数千名信奉国教的自耕农被遣往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而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后，又造成圆颅党与清教徒的外逃，因而大批的英国人来到北美这块殖民地，还有大量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及其他少量的欧洲国家的移民。这样，移入北美大陆的人与日俱增。

移入北美大陆的人成份复杂。其中，有很多是被剥削得一贫如洗的人。由于无法筹集横渡大西洋的旅费，或者由于初到美洲，人生地不熟，无以为生，他们不得不与那些公司、船主或资本家订契约，卖身为奴，这就是所谓的“契约奴”。在那时的北美殖民地，有不少的人被迫当契约奴。

在海外掠夺过程中，欧洲殖民者又掠夺非洲的黑人为奴，用他们作为开发美洲的主要劳动力。因而在北美大陆，有不少黑人奴隶。他们穿不暖，吃不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不少人在北美大陆的开发过程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奴隶们的累累白骨变成了殖民者手中的灿灿黄金。

英国在北美大陆总共建立了13块殖民地。他们都处在英王的统治下，各自为政，没有什么政治联系。他们同宗主国英国之间也有不同的关系。在独立战争之前，宾夕法尼亚与马里兰两州仍由领主统治，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则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其它的殖民地都由英王直接控制。

因为殖民地与英国远隔3000英里的大洋，英王及其大臣对那些属地的控制是微乎其微的，主要是通过派任殖民地总督的方式。13个殖民地的总督，基本上都是英国的贵族集团与军事头目，握有军政、财政、司法大权，代表英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来镇压殖民地人民。虽然从1619年的弗吉尼亚立法会议起，各殖民地就先后实行了资产阶级代议制，设立了自己的由民选产生的议会，但由于殖民地对选举权作了苛刻限制，因而被选入议会的都是豪绅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殖民地人民对其政府的控制却也远胜于英国本土人民对其政府的控制。

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英国政府盼望殖民地能为它充分提供原料和半制成原料，同时又希望殖民地成为它的商品消费市场。英国便主要以此为

根据来制定其殖民地的政策。克伦威尔执政时期，议会通过了一系列航海法令等限制殖民地贸易的发展，英国政府限定北美殖民地生产的烟草、蓝靛等农产品必须首先运到英国销售，北美 13 个殖民地居民所需工业品则必须单独从英国输入。这些规定都严重地阻碍了北美经济的发展。

在 18 世纪中期，英属北美的 13 个殖民地在经济上仍是以农业为主，各地的农业人口均在 90% 以上，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在新英格兰一带，纺织、伐木、采矿、冶炼和造船等工业已经兴起，各式各样的手工工场日益增多，殖民地之间经济往来也日趋频繁：新英格兰一带的殖民地工业品销到南方，而南方殖民地则以粮食和原料供应北方，从而初步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在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已有 2000 万美元的出口额了。

英国政府对北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限制殖民地的发展，特别是对北美制造业限制更为严厉。

为了保护英国本土的厂商利益，英国政府下达禁令，不准美洲的殖民地制造铁制品，目的是为了增加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英王的这些做法，阻碍了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当地的工商业破产，工人失业，农民也因剥削政策而受损失。因此，北美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

1763 年，英国击败法国及其印第安联盟而取得七年战争的胜利，而使美洲殖民地与大不列颠的关系有了崭新的变化。

英国打败法国之后，成为了密西西比河以东整个大陆的主宰，把法国势力逐出了北美大陆，而且还取得了印度，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和海洋上的霸主。但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的债务增加了一倍，财政严重亏空。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英国政府提高了国内税收。这又引起了大地主和资本家的不满，因为他们是主要税收的承担者。由于大地主和资本家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因而使议会通过了向殖民地征税的提议，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这样大地主、资本家就把课税的重担转给了北美居民。

英国政府为安抚印第安人而使边境维持安静，曾宣布法令禁止白人移居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本来参加对法兰西和印第安联盟战争的士兵被许愿，可获得一块免费土地，如今也不行了，这使得退伍军人们大为恼怒。而殖民地的土地投机者们也深为不满，因为他们想通过侵占割取当地部落人的土地来发一笔财。尽管英国政府三令五申，仍有大批的殖民地移民，无视禁区线，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进入今天的肯塔基。

为了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和失败的法国人的复仇，议会又派遣了一支 1 万人的常备军到北美驻扎，而由殖民地人民承包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而这一措施，更是进一步恶化了国王与殖民地的关系。

1765 年，英国政府决定在北美大陆征收印花税。这条法令一颁布，北美人民更为恼火和不安。因为近一个世纪来，殖民地人民已确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受到他国的“国家精神”的鼓舞，而不愿受任何无理的压迫。正因为这样，殖民地各州一致行动，反对英国政府在北美征收印花税。殖民地人民发誓：只要英国政府一天不废除《印花税法》，他们就一天不买英国货。抵制印花税运动加强了北美殖民地的团结。

北美抵制英货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英国的工商业，因为它们就是靠殖民地市场为生的。英国本土的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

在殖民地人民的坚决反对下，1766年3月英国政府废除了《印花税法》。但英国仍坚持它有权向殖民地征税。殖民地人民虽不满英国政府任意课税，但仍遵守贸易上的规定与征收关税的要求。

1767年，查理·唐森德就任英国的财政部长，他向议会提出“征收输往英国的殖民地的所有玻璃、纸、铅、茶叶等产品的关税”的法案，并被议会通过。并且规定：为杜绝走私，英国的税务人员可随时到船舶、店铺、货栈和私人住宅进行搜查。这些规定与法令顿时在殖民地掀起轩然大波。北美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日益激化。殖民地人民再次掀起了规模很大的抵制英货运动。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英政府不废除这一法案，殖民地人民将不偿还向英政府借贷的一切债款。

这次抵制英货运动导致英内阁的垮台。新内阁为了平息此事件，废止了关税法案，仅有茶税一项留下。此时，英政府与殖民地间的冲突表面上有了缓和，其实，双方斗争仍很激烈。

东印度公司基于财政理由，决定把生产过剩之红茶，倾销到北美殖民地。英政府为协助该公司，而于1773年准许将茶叶运往殖民地，条件是价格可低于一先令，但不得少于殖民地的每磅三便士的税率。英政府此举使表面上缓和了的情势，又立刻尖锐起来。殖民地人民认为，所谓的“必须付三便士的税率以象征英王的权威”不过是个借辞。多付几便士茶税，他们并不在乎，只要否定英政府所自认拥有的课税权利。在此情形下，终于发生了一系列正面直接冲突。

英驻军在波士顿遭到袭击，在英军反击时，有五名市民殒命；罗德岛港口的普罗维登斯人民又烧毁了英税关的船只。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发生在1773年12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在一个严寒的夜里，有一批波士顿的爱国志士乔装作印第安人，闯上几艘停在波士顿港口的英国货船上，把价值1.5万英镑的英国从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茶叶抛入海中，以抗议英政府的统治。“波士顿倾茶事件”标志着北美人民的反英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波士顿倾茶事件是令英国政府所无法忍受的，国王决定以强硬手段来对付造反的马萨诸塞州人民。从1774年3月起，英国政府一连颁布了几道法令：封锁波士顿港，绝对禁止其与外界往来，要用饥饿来使波士顿人民屈服；英议会将俄亥俄州到密西西比州之间的土地交由魁北克管辖，粉碎人民向西迁的希望；同时又承认加拿大的天主教徒有其信仰自由，并笼络当地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移民，造成他们与英国殖民地里清教徒的对立，而阻止殖民地人民西迁。

英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更使北美人民怒火万丈，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武装反抗英王的斗争。

北美殖民地各州为谋求统一运动，而派遣代表到费城召开会议，商讨共同对付英国的办法，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55人，全是殖民地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人们的政治倾向大致分三派：一是激进派，其代表人物是沙弥尔·亚当斯；一是稳健派，其代表人物是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一是保守派，其代表是约翰·贾。会议刚开始的时候，保守派气焰甚是嚣张，投票反对独立，要求与英国统治集团妥协。后来，由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才把这种逆势扭转过来。

“大陆会议”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一面。但在人民推动下，它仍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发表《权利宣言》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理应享有“生命、

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再是用“大陆联盟”之名义制定了一套对英国的禁令，即禁止从英国输入任何商品，禁止把任何商品输往英国，禁止购买英国货，违禁者以“美洲自由之敌”论处。后面的这一决定，意义重大，因为在此之前，北美13个殖民地从来没有过共同的立法、行政机关，而此时“大陆会议”制定了强制性的、在北美各殖民地通行的法令，而成为最高的政权机关。

这样，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出现了两个政权对立和斗争的局面，一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反动政权；另一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政权。双方斗争激烈，水火不容。

1775年爆发的莱克星顿枪声是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从此，声势浩大的北美独立战争揭开了序幕。

马萨诸塞州的总督佳奇，深信他的部队将在1775年春受到攻击，便决定先行占领民兵在康柯德的部分非法军火库。于是，在4月18日晚上，他派遣一支800人的队伍，向莱克星顿进发了。

但是，爱国者事先侦察到了这个消息。银匠保尔·瑞维尔骑马出发，奔往各地报警。于是，波士顿近郊的民兵迅速集合起来，埋伏在通往康柯德的大道两侧。4月19日拂晓时刻，当英军走近莱克星顿时，突然枪声响了，民兵伏击了英军。当英军勉强走到康柯德时，发现军火早已转移了，而且在那儿又遭到了更猛烈的抵抗，于是便仓惶逃回波士顿，沿途又不断遭到民兵的狙击。在这次战役中，英军死伤和被俘有300人，这就是历史上的“莱克星顿枪声”。它如同第一声春雷一般，掀起了北美人民反抗英王统治的新高潮。

莱克星顿战役胜利的消息极大地激发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爱国热情，各地民兵队伍前来支援波士顿人民。几天之内，汇集在波士顿的民兵就达2万多人。他们把英军紧紧地包围在波士顿地区。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开幕了。为了把人民组织起来，有效地进行战争，会议成了最高革命政权机关。它下令招募志愿军，发行纸币，向国外购买军火，并把汇集于波士顿附近的各地民兵整编为“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

1775年7月3日，华盛顿在波士顿附近的剑桥就任大陆军总司令。他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从战略上考虑，为防止英国利用加拿大这个辽阔的基地向他们反攻，而决计先占领加拿大。1775年，联邦的军队兵分两路进攻加拿大，到年底，已掌握了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并且封锁住了英军驻魁北克的部队，只有通向海上的路线未打通。1776年冬，由于满载援军的英国舰队到达，殖民地联军不得不撤退。

1776年5月，新任英军统帅威·郝威放弃了波士顿，而退驻哈利法克斯。这样英军在北美最大的一个据点波士顿落入了殖民地联军手中了。但英军也拟定了攻打纽约及费城的计划，以切断殖民地联军南北联络线。同时，英国政府还从德国一些小邦雇佣了2万余名士兵并购买了许多大炮来镇压北美殖民地的独立革命。

双方针锋相对，势不两立。1776年4月12日，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决议，授权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要他们与各殖民地一起联合宣布独立。其它各殖民地也做出了相应的表示。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五人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7月4日，从此成为美国的国庆日。

退驻哈利法克斯的郝威在得到英国海军的大量援助之后，发动了新的攻

势。但可惜他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倘若英政府使其精锐集结于纽约，把 3.5 万名正规军全部投入战场，则新英格兰之归属尚不可知。郝威把 3.5 万人分为两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溯哈得孙河而上；另一路由柏格恩率领，自加拿大向阿尔巴尼方向推进。

华盛顿率兵在费城迎战郝威，连遭挫败，而退出费城，到伏基谷中过冬。

1777 年 6 月，柏格恩率领军队 8000 人从加拿大出发，沿哈得孙河谷南下，企图会合据守在纽约的英军，以钳形攻势切断新英格兰诸州与其他州联系。可是他一离开基地，踏上美国土地，便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新英格兰的人们切断公路，破坏桥梁，使英军寸步难行。柏格恩不仅到处挨打，而且无法取得军用物资补充。无奈，只好退回纽约州北部的要塞萨拉托加。各地民兵与联军乘胜追击，把龟缩在萨拉托加的英军团团围住。10 月 17 日，柏格恩弹尽粮绝，带领残余部队 5600 人投降。

1777 年的萨拉托加大捷显示了北美人民的力量，提高了北美人民胜利的信心，从而也扭转了战局。所以，萨拉托加大捷是北美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在七年战争中被英国夺走殖民地的法国，一直有心夺回其殖民地。在美国当初求援时，只是对战争无把握而举棋不定。萨拉托加大捷之后，法国立刻决定参加战争。1778 年 2 月，法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并与美国签订军事同盟协定，规定：法国以海、陆军和金钱援助美国取得独立；而美国则在商务关系上给法国以“最惠国待遇”，并帮助它防守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1779 年 6 月，西班牙为收复其被英国夺去的直布罗陀、佛罗里达等殖民地，也参加到法美方面对英作战，这样，北美独立战争得到法国、西班牙的援助。北美人民更加斗志昂扬，决心彻底打败英国统治者。

除了北美大陆上的英军与北美民兵在战斗外，在大西洋上，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海军也展开激战。由于英国依仗了海军优势，而在海上横行霸道，任意阻拦、搜查、炮击中立国商船，而导致 1780 年俄国、普鲁士、丹麦等国组织“武装中立同盟”，以实力保护中立国航运，冲破了英国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对美国大为有利。1780 年 12 月，荷兰以其商业利益受到英国损害而参加美国、法国和西班牙一面对英作战。

这样，英国陷入了四面楚歌之悲境。英军的失败已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英国决定放弃扩大战争的想法，把所有的军队集结在纽约，然后用海军力量来消灭殖民地军。于是，1778 年 6 月赫威放弃了费城，回到纽约。不久，克灵顿替换赫威成为英军统帅。尽管，英国政府进行战场调整，但是形势的发展更对英国不利。

1778 年 6 月，法国舰队开到美国的海面上，两年后，法国 6000 人的军队到达北美大陆。这样，北美反英力量进一步增强。

英军在北方不能取胜，于是转向南方进攻，企图先占领最弱的佐治亚州，再以破竹之势北上，并希望得到保皇派的帮助。1778 年，英军攻占佐治亚州的重要港口萨凡纳，并由此而楔入内陆。

1779 年，英军倾巢出动，攻占了佐治亚州的内地和南卡罗纳州大部分地区，并向北方挺进，企图乘势恢复大英帝国昔日的统治。

“大陆会议”匆匆忙忙地派了一支大陆军抵御北上英军，结果在堪登战役被打得大败。幸好，美国南方各地人民奋起反抗，组成游击队，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来对付敌人。在 1780 年 10 月发生的王山战役中，美国南方民兵游击队歼灭了英军一支主力部队。美军马上利用这一可乘之机，转入反攻。

在美国大陆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英军在南方无立足之地，于是退守弗吉尼亚州海湾的约克顿，等待着英国海军的援助。

到此时，形势已起了根本性变化，英军由优势转为劣势，而美军则由劣势转为优势了。

英军统帅康华利退到约克镇后，不久就被美国大陆军所包围。法国海军也封锁英军海上退路，切断了英军的海上供应线。在约克镇的英军现在已陷入绝境。

康华利见大势已去，1781年10月19日率领8000名部下出城送剑至华盛顿处请降。这意味着，独立战争基本结束了。

1782年2月，英国诺斯勋爵内阁垮台，接着由一个和平内阁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便是和平谈判会议的召开。同年10月，双方在巴黎签订临时和平条款。1783年9月3日正式签署和平条约后才生效。英国政府承认北美13个州的独立，并将密西西比河以东大片土地割让给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这样，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美国独立战争也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它为美国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这场独立战争也给西方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此后争取独立的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美国独立战争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鼓舞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发展。可以说，美国这场独立战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影晌都是巨大的。

马克思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自从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以来，共产主义的狂飚吹遍了欧洲大地，而且愈来愈强劲。无数的热血青年投入或将要投入到新的革命洪流中去。科学共产主义刚刚问世，欧洲大陆就出现了革命风暴。科学共产主义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并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是一位学者，他在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解放斗争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它给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消灭一切剥削、压迫，争取彻底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是革命的领袖，由他所创立的理论在他的众多后继者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并成为地球上近半数人们所信奉的思想。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封建制度被铲除了，资产阶级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作，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产生了一对孪生子，这就是利益根本对立、矛盾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言：“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

1640 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89 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经过曲折的斗争，资产阶级建立了专政。他们通过国家机器，采用暴力，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许多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都发生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一场技术革命。因此，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1770—1840 年间，英国工人的每日工作效率平均提高 20 倍。1840 年，英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45%，被称为“世界工厂”。1820 年，法国的蒸汽机为 65 台，1847 年猛增到 4853 台。德国的莱茵河两岸的鲁尔等地区的采矿、冶金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也日趋尖锐。1825 年，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

1837 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危机的直接受害者仍然是劳动人民。恩格斯描述当时英国工人的遭遇是：“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软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资产阶级用他们的罪恶证明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31 年 11 月 21 日，里昂纺织工人为了使厂方同意实行新的计件工资率，改变恶劣的生活条件，高举着“做工不能生活，不如战斗而死！”的旗帜游行示威。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工人们奋起武装反抗，举行起义，经过 3 天的激战起义失败了。

1834 年 4 月 9 日，里昂工人为了反抗政府颁布的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和营救被捕的工人互助会领袖，又举行了起义。工人们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政治要求。这次起义还得到巴黎、马赛等城市工人的响应。经过

6 天的巷战，起义又被镇压下去了。里昂工人起义标志着法国工人开始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838 年，英国的工人团体“伦敦工人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民宪章”请愿签名运动，得到了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拥护，在“人民宪章”上签名的人数有 125 万之多。但是，国会置人民的正义要求于不顾，否决了对宪章的审议。1840 - 1842 年的经济恐慌使宪章运动再次兴起，且愈具政治性、组织性和群众性，“全国宪章派协会”成立，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 300 多万人，然而国会再次否决了讨论“人民宪章”的正当要求。愤怒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但被镇压下去了。1847—1848 年的经济危机使宪章运动再兴高潮，有的地方提出了“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但是，国会再次拒绝了宪章派的合理要求。英国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的工人运动也发展起来。1844 年 6 月 4 日，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举行了武装起义。他们捣毁工厂和企业主的住宅，销毁帐簿和财产契据，并同军警展开搏斗。这次起义坚持了 3 天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因为这次起义直接反对私有制和剥削。所以，马克思说：“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恩格斯也对这三次工人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作现代化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作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形式。”

在这三次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不断地总结失败的教训，不仅建立了工会组织，而且还开始建立了政治组织，如英国的全国宪章派协会（1840 年），法国的四季社（1837 年），德国的流亡者同盟（1834 年）、正义者同盟（1836 年）等等。很显然，历史发展到 19 世纪 30、40 年代时，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在这一“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于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毛泽东语）

“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他们能够创立崭新的学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实践中完成了立场、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发展的源泉是“绝对精神”（又叫“绝对观念”）。这种“绝对精神”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是永恒存在着的。正是绝对观念的运动变化才产生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他认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矛盾是万事万物运动和发展的唯一动力。他阐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这些都是他对人类作出的重要贡献，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的。他认为整个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绝对精神”的发展，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费尔巴哈是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

表。他正确地论述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批判了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在物质以外没有任何独立的“绝对精神”存在，物质决定精神。但是他在坚持唯物论的同时，却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因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来源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是英国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价值理论奠定了他们在经济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对立的经济根源，这就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而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是相互矛盾的，利润愈高，工资愈低；利润愈低，工资愈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 - 1837年）和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圣西门把资本主义叫做“本末倒置的世界”，“游惰者”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而劳动者则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傅立叶尖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是由富裕造成的。欧文认为，“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世界变成地狱”，是社会一切罪恶和贫富不均的总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设想。

圣西门主张：“一切人都应当劳动”，迅速改善最贫困阶级的物质、精神状况，用统一组织社会生产的办法代替私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人的管理应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来代替。傅立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程度”，预计在未来社会中，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乐生的需要。欧文认为，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组织，主张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并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生活条件。在他们看来，“理性”和“天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过去，就是由于缺少“天才人物”，才使社会陷入迷误、斗争和痛苦的境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不合乎理性和正义的。他们幻想通过说服教育和示范的办法，呼吁上层社会人士协助，使其理想变成现实。他们以为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主张，剥削、压迫和邪恶就会自然消除。他们反对一切政治运动，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批判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有益的内容。

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基本理论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没有这些思想理论基础，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19世纪30~40年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对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重要的成就有：施莱登于1838年和施旺于1839年提出的细胞学说；1842年迈尔和焦耳发现的能量守恒转化定律；达尔文在1844年提出的物种可变的思想，后来形成为有名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当时所有的自然科学成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

对历史科学深入细致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大学时，马克思就选修了德意志法学史、罗马法学史和近代艺术

史等。1843年5月—10月他对英、法、德、美、意大利、瑞典、波兰等国历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他所阅读的历史著作时间横跨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2500多年,内容涉及到世界史上的各种重大事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认真地研究了英国的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历史,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毫无疑问,历史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南部的特利尔城的律师家庭里。12岁时,他进入了特利尔中学。在这里,他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并开始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1835年10月,中学刚毕业的马克思来到了“大学城”波恩,听从父亲的安排考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学。一年后他又转入了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律,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对历史和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37年,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了柏林的“博士俱乐部”,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作为青年黑格尔分子,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

1841年,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反对宗教反对专制制度的宣言书,他的主张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分歧,最终导致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表明马克思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大学一毕业,马克思就一改青年黑格尔派纯粹理论批判的立场,而把理论与社会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842年1月,莱茵省的自由资产阶级在首府科伦创办了《莱茵报》。从4月份开始,马克思为该报撰稿,10月15日,他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从这时起到1843年3月17日辞去主编止,又称为马克思的《莱茵报》时期。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期。

由于《莱茵报》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加紧了对该报的干涉和迫害。马克思愤而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5月底,来到了未婚妻燕妮的居住地克罗茨纳赫,并于6月19日举行了婚礼。从此时至11月离开祖国的时期内,他除了继续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外,还广泛地阅读和摘录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和政治学著作,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纠正了黑格尔对国家与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国家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1843年11月,马克思和燕妮移居“新世界的新首府”巴黎,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期的侨居生活。从此时到1845年2月被法国政府驱逐,可称为他的巴黎生活时期。这一时期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是又一个决定性转折时期。

当时的巴黎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发达地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是各种流派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集中地之一。这里有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大量的各国流亡工人及组织。因此,在这里一方面存在

着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便于深入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研究，所以马克思选择了巴黎作为和阿·卢格共同编辑刊物的地点，并建议将新编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德法年鉴》的任务是“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也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1844年3月，《德法年鉴》正式出版了，在这个刊物里载有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等。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类解放”，才能把人从私有制和金钱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表现出了一种彻底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他认为“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马克思考察了德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卓越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光靠理论是不能推翻旧制度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马克思最后又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和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

但《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随后，马克思即转入了对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并深入到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去。1844年8月，他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具有奠基性的重要地位，代表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

在马克思基本确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同时，也就是在1843年—1844年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工厂主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普鲁士的正统思想和宗教传统在这个家庭里是根深蒂固的。1834年，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理科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许多教师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

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自由贸易理论入手，研究了众多的经济范畴诸如商业、价值、价格、地租、资本、劳动、竞争等等，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不可克服性。这个大纲用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被马克思誉为“天才大纲”。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见了。从此以后，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和战士在一个旗帜下携起了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同甘共苦，奋斗终身。

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部合著《神圣家族》出版了。这部

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石。用列宁的话说，“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及其危害，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只有劳动群众才“创造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神圣家族》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在这部书中，“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部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这部著作是《神圣家族》的继续。它第一次论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第一次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几个基本社会形态；它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形成。

1847年7月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发展、完善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也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这里实际上回答了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并表明剩余价值以利润形式被资本家占有。于是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由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了，这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科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者注）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它“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

《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指出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

作用”，但是现在却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掩盖着的剥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使“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是一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世界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不断地总结革命经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丰富和完善；而且，他们还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因时因地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正如他们在1872年所指出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奥斯塔利兹之战

1805年，奥斯塔利兹之战，又被称为“三帝会战”，以拿破仑大军的完全胜利，俄、奥军队的彻底失败而结束。这场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翻开了欧洲战史上新的一页。

18世纪末的法兰西，发生了一场旨在推翻等级制度从而确立共和的变革，激起了欧洲专制君王们的愤怒和惊慌。几乎所有的君主国家，由于害怕革命的蔓延而集结到了反法联盟的旗帜下。一时间，法兰西成为众矢之的。反法联军的骑兵不时出没于法境内外。尽管英勇的法国人民一再击退了他们，各国始终未曾放弃反戈一击，其军队的规模日愈庞大，进攻也一浪高过一浪。战争就这样持续进行着，它结束的时候也许是一方对另一方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

当外国军队不断涌来的时候，法兰西国内的风暴也一刻没有停歇。党派之争、镇压叛乱、反对复辟、烧毁地契……这一切都是以疾风暴雨的方式进行的，伴随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雅各宾派的革命独裁发展到了顶峰。雅各宾派的统治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高潮。然而党内的分裂使这一派的能量日趋枯竭，最后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推上断头台。1795年10月27日，法国成立了督政府。但此时共和国的军事形势是不利的，各国的军队在虎视眈眈，企图一举摧毁法国军队。法国需要杰出的军事家和强大的军队来保卫国家。

在督政府执政期间，拿破仑由于出色地领导了意大利方面军而获得政府的赞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796年成功地指挥了皮埃蒙特战役，使波拿巴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1797年，拿破仑·波拿巴回到了巴黎。这时，督政府的权力达到了极盛时期。因为在这时期，它已经完全没有拿枪的敌人了。督政府平定了国内反动势力，打败反法同盟后，就强迫奥地利接受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时与德意志帝国进行谈判。然而，督政府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使自己真正变成欺凌别国的罪人。威尼斯共和国被瓜分了。督政府这一作法无疑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法兰西隐伏新的危机。

拿破仑凯旋归来，受到督政府的欢迎。这种热烈表示，在督政府是勉强的，而人民是真心实意的。督政府授予拿破仑以任何共和国将军从未享有过的荣誉。在卢森堡宫建起了一个祖国祭坛，用从意大利虏获的多种旗帜搭起了一座牌楼，让拿破仑从牌楼下走过去参加盛大的欢迎他的仪式。督政府主席巴拉斯在对他的胜利表示赞扬和祝贺之后，就促他“举行一次出征，为伟大民族雪洗耻辱，恢复尊严，为他一生的功业增光”。这次出征指的是征服英国。表面是准备在英国登陆，实际上却是准备进攻埃及。督政府这样做是基于防备心理的作用。因为拿破仑在意大利独断独行的举动，以及他那有些做作的朴实中透露出来的野心，令督政府感到担心。督政府看到远征埃及可以使一个可怕的将军离开，又能假道印度攻击英国人。这真是一个堪称一石二鸟的好主意。不幸的是，当拿破仑两年后秘密回到巴黎来的时候，督政府的官员们才发现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1799年10月，拿破仑在弗雷居斯登岸。他以凯旋者的姿态，行经全国各地，从地中海沿岸来到了巴黎。拿破仑的来临激起了全国温和派群众的热情。他受到善意的欢迎，他成了所有派别的争夺对象。他表现得庄严、朴实、

稳健，冷眼旁观。尽管他不急切，不浮躁，却有一种信心很足的神态，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种阴险的用心。他不说出来却让人猜测他的用心，因为一件事情总是有人希望才会发生。拿破仑争取了一批在巴黎的、对自己表示热忱和忠诚的将军和部队。他们商定要以特殊形式召集两院中最温和的代表，向元老院陈明国家遭受危难，雅各宾派过激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要求把立法机关迁到圣克卢，并任命唯一能够拯救祖国的拿破仑将军为部队司令，然后用武力推翻督政府，并暂时解散立法机关。这个计划定在雾月 18 日晨执行。

1799 年 10 月 18 日，元老院被迫同意了谋叛者的要求。拿破仑取得第一步的胜利。19 日，拿破仑在元老院外对他的士兵们说：“弟兄们，我率领你们取得了胜利，我可以依靠你们吗？”士兵回答说：“可以，可以，将军万岁！”拿破仑接着说：“士兵们，我们原以为元老院能拯救祖国，但恰恰相反，他们肆意捣乱，有的煽动分子企图挑拨元老院来反对我！弟兄们！我可以依靠你们吗？”“可以，可以，拿破仑万岁！”“好吧，那我就来教训教训他们了。”从这以后，拿破仑就开始了他的军事统制。这个人不久便把法国变成一支军队，而且将使全世界只听到法兰西军队的脚步声和法兰西意志的声音。

“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取得了法国最高统治权。此时，法国人都感到需要有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复兴法国。拿破仑正是适合于这一事业的伟大人物和功名卓著的将军。

拿破仑依靠自己在军事上的胜利，逐渐将自己的地位巩固下来了。法国军队在他的指挥下，打败了包括奥地利、俄国、葡萄牙、奥斯曼帝国及英国的军队，逼迫这些国家与之签订了和约，从而实现了“普遍的和平”。这些胜利使得拿破仑在政治上如日中天。1802 年 8 月 2 日，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终身第一执政，当了皇帝，元老院将最高权力交给了拿破仑。

拿破仑在国内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随着领土的扩张而发展到国外。拿破仑分别于 1802 年 8 月 26 日和 9 月 11 日把厄尔巴岛和皮埃蒙特并入法兰西共和国。10 月 9 日，他又占领了巴马国；最后，10 月 21 日，他派遣了一支 3 万人的军队进入瑞士。英国则以此作为它发动战争的理由。在亚眠和约后不久，英国政府就在策划第三次同盟。和约对于英国来说，不过是一个缓兵之计。而拿破仑的合并小国，以及他在邻近各共和国中所保持的影响，则加速了他与英国的破裂。从拿破仑这方面来说，战争是他的维他命，他渴求战功，企图以征服他国来扩大领土，以军事胜利来达到个人的极高地位。因此，他不可能就此罢休，既然他不想要自由，那就需要战争。

1804 年 11 月 6 日，被击败的俄奥两国又重新走到一起。两国秘密地订立了对法“防御同盟”。1805 年 4 月 11 日，英俄又正式签订《英俄同盟条约》。此后不久，奥国便加入了“英俄同盟”。这样，第三次反法同盟成立了，欧洲又将陷入一场战火的洗礼中了。

第三次反法同盟成立后，英国和法国进行的第一次战役发生在西班牙南端的一个海角。这次海战，英舰击沉法舰 19 艘，俘 4 艘，法国遭到失败。此战役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拿破仑从此致力于陆地上与各国的角逐。

英国一直是法国的海上主要对手。俄奥联军则是法国陆上的老对手。奥国查理大公受命率领 9 万大军围于意大利。法国马塞纳元帅所统帅的 5 万法军居于守势。在南德意志方面，斐迪南大公率兵 6 万，暂取守势，相机转入

反攻，打算在俄军到达或意大利方面获胜后，向法国内地进攻。在提罗尔方面，约翰大公率4万军队准备驰援南德方面。这是战争初的双方力量对比情况。

不久，麦克替换查理大公任奥军总司令，麦克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将领，拿破仑评价他是“头脑混沌而自以为才高八斗”。麦克认为拿破仑为防范英军在法国登陆，必然以重兵把守北部海岸。另外，为对付国内叛乱也要留兵驻守。麦克的估计是错误的。基于这种估计，麦克不顾奥国兵力不足、武器弹药不足、士气低落等情况，贸然与费迪南亲率大军5.8万人，进至伊勒河畔。这一着棋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奥军的失败，并直接影响到以后的作战。

库图佐夫将军率领俄军第一军团5.5万人，由布罗提出发，约在10月下旬始能进至莱茵河畔。另外，布克斯豪登率第二军团约4万人，同一天由布勒斯特出发，行动迟于第一军团，始能至多瑙河左岸，进出于波希米亚。剩下的2.5万人编成两个登陆部队，拟分别由意大利的纳波尔和瑞典所属之普美伦登陆，威胁当面法军。俄奥的作战意图是双方会合兵力，在德意志战场上与波拿巴决一雌雄。

拿破仑获悉奥军动向后，立即离开布伦，匆匆返回巴黎。9月24日，他率军开赴前线。拿破仑这次打算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在俄奥会合之前，全力打击奥军。然后再一举击败俄军。此外拿破仑出色地运用了他的政治手腕，对持骑墙态度的普鲁士采取温柔政策，使之保持中立；同时，在北海岸只留少量部队作防御之用，并迅速调集了布伦的精锐部队，使得他的大军总计有24.4万余人。

法军直扑奥军。9月26日拿破仑抵达斯特拉斯堡。法军主力于9月25日至28日渡过莱茵河后，进至内凯河一线，再向多瑙河推进。拿破仑的意图是实行迂回，在乌尔摩以东的多瑙河畔，突破奥军普哥斯登、诺伊堡和多瑙河乌兹一线，切断奥军同本国及俄军联系，并先行击破突进之奥军。

10月6日，法军到达乌尔摩地区的多瑙河左岸海得亨至魏森堡一线。此时，莱茵方面军依第六军团在海得亨掩护右翼。美因兹方面军南进至魏森堡及其以西地区为左翼。库图佐夫率领俄军第一军团，正向莱茵河右岸之布劳瑙前进，约10月下旬方可到达该地。俄军第二军团则在维也纳以东地区，距离很远。俄军对法作战意图了解不多，他们又与奥军缺乏联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在10月初切断了奥军退路。麦克见势不妙，向乌尔摩运动，但为时已晚。10月7日，拿破仑决定渡过多瑙河。麦克派出约5000人前来堵击，然而此举未能成功。奥军当即向乌尔摩退却，另一部退往梅明根。

拿破仑原本打算先以重兵击退急进之俄军，以解后顾之忧，但他听说俄军无所行动，遂率法军第二军团向西转进，并令内依、兰诺、缪拉各军团分进合击，缩小对奥军主力的包围圈。

麦克此时若能审时度势，迅即撤退，或许有一线希望脱身。然而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认为巴黎局势不稳，法军很快便会退兵。结果延误时机，致使乌尔摩奥军成为瓮中之鳖。10月16日，法军开始炮击乌尔摩市区，麦克于次日率部3万向拿破仑乞降。13日从海得亨突围的奥军约8000人，由于受法军追歼，也被迫投降。麦克乞降后被释放回国。这位将军在军事法庭上还这样说道：“我全在梦中！”或许在监狱中他才能清醒过来吧。

乌尔摩在战史上被人们称为“乌尔摩之围”。拿破仑以闪电般的行动，切断了俄、奥两军之间的联系，迂回包围奥军，一举围歼了乌尔摩之敌，创

造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拿破仑对此战胜利颇为自得，他说道：“以如斯狭小之地域内，使机动如此之大军，以前未尝有之”。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乌尔摩的胜利，就不会有奥斯塔利兹战役的胜利。乌尔摩之战为奥斯塔利兹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石。

乌尔摩之败使奥军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奥军无力单独抗衡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军转而依靠俄军而战，企图通过俄军力量打败法军。于是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成为俄奥联军司令，他们准备把兵力放在莱茵河一线，确保奥境以抗拒法军的进攻，最后打败法军。

拿破仑打败奥军后，乘着胜利的余威，于11月13日占领维也纳，然后推进到摩拉维亚，迎击与战败的奥军会合的俄军。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法军，库图佐夫感到兵力有些不足，他于是命令部队在摩特伦附近北渡多瑙河，企图与第二军团会合后再战。此时，拿破仑的大军正逼近维也纳，库图佐夫也不能舍此保彼了。

11月17日，库图佐夫的第一军团与从维也纳北撤的奥军会合于普里兹，双方兵力计有4.5万余人。之后，姗姗来迟的第二军团也在11月22日与第一军团于沃尔谋次顺利会合，战线因此而趋于稳定。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在11月18日亲临沃尔谋次。当他到达沃尔谋次后，他突然发觉自己亲临战场并不能感动士兵。士兵们见到皇帝时神情冷漠阴郁，一片沉默。士兵粮秣不足，单薄的衣服难以抗御寒风的侵袭，他们一心只想着去邻近村庄打家劫舍，军纪废弛。亚历山大一世与军中的主要将领也产生了分歧。库图佐夫担心同法军进行决战，会中了拿破仑的计策，因此建议按兵不动，等增援部队到达后再战。亚历山大一世则认为此举过于慎重，无异于示弱，宜与拿破仑速战速决，他坚信自己的军队是可以创造任何英雄业绩的。最后，库图佐夫屈服了。就在俄皇来战地的同时，奥皇弗兰茨也到达了军中。其时库图佐夫已失去了实际指挥权，他的司令之职已是徒有虚名。有一天，他向陛下询问关于调动军队的设想，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不关您的事”。对于一支几万人的军队来说，没有这位将军的指挥，想战胜对手几乎是不可能的。

普鲁士皇帝也派豪格维伯爵为特使去与拿破仑谈判。普鲁士皇帝想借调停为名，试探一下拿破仑的意图。如对方不接受条件，就决定发兵15万参加对法作战。有人谓之为“武装调停”。

由于俄奥联合作战，战场形势突变。法军为了应付查理大公的9万奥军和保障后勤供应，以及保护侧翼，不得不延长战线，分散兵力。内依元帅率军西去提罗尔；马尔蒙将军率部去斯提利亚；达乌元帅率部东去匈牙利；伯那多特元帅率部北去波希米亚。现在拿破仑手中的兵力只有缪拉、苏尔特和兰诺三位元帅的部队，在数量上法军处于劣势。各地法军如向主力靠拢，在一天内可集结5万余人；三天内可达到7.5万人；四天内可集结8.5万人。此时，俄普结盟和特拉法加海战法军失利的消息传至军中，人心不免有些动摇。拿破仑考虑的是：法军在希尔诺附近只有6万余人，缺乏攻击力。如俄奥的增援部队一到，兵力将增加一倍，普鲁士很可能也将派兵增援。现在只有趁联军尚未全部集结，普军还未正式参战之际，击破当面之联军。在这一思想引导下，拿破仑采取了缓兵之计，以求在短暂之日，适当集结兵力进攻。拿破仑的措施是：一、急令伯那多特、达乌元帅火速回师支援；二、推迟接待普国特使，以暧昧态度使犹疑中的普鲁士仍举棋不定；三、派遣萨瓦里将

军前往沃尔谋次谒见俄皇，要求停战一天。

萨瓦里将军于11月25日前往联军驻地。他此次身负双重使命：向亚历山大呈递拿破仑的亲笔信，同时，伺机刺探俄奥联军兵力部署及官兵士气等情况。萨瓦里回来时，对俄奥联军的弱点已了如指掌。这样，拿破仑就做到了知彼知己了。

萨瓦里回来时还带回了俄皇的复信。信中写道：“感谢您派萨瓦里将军前来送信，特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我只希望欧洲能在正直的条件下和公正的基础上重建和平。同时渴望个人仍能有机会对您表示友好。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亚历山大”。从文字中可以看出，停战的可能性不存在。

正当法国特使与俄奥谈判之时，拿破仑已获悉援军于12月1日即可到达，遂令部队作好准备，摆开决战姿态。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很快命令军队发动进攻。11月28日，在雅沼城附近双方军队相遇。俄奥联军小胜法军，法军损失了几个骑兵连。这一胜利使俄奥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加上亚历山大一世派去劝拿破仑投降的特使道尔戈鲁向他报告，称法军害怕在奥斯塔利兹同联军作战。此时，俄奥联军有9万人，而法军只有7万。这些都使俄皇对自己的成功深信不疑。

在12月1日，俄奥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五路前进，占领奥斯塔利兹西南方狄尔尼兹至北方斯尼兹一线。这五路部队基本上以普拉钦高地为核心。第一路至奥格兹附近。其一部位于狄尔尼兹，作为左翼；第二路约1.16万余人进至普拉钦高地南侧；第三路约1.3万人进至普拉钦东南侧；第四路进至喀尔佐诺雅兹之西，兵力约2.5万人；第五路约4600余人，进至普拉钦东北侧，为右翼。库图佐夫的司令部及总预备队8500余人，在喀尔佐诺雅兹。计划规定联军主力开往法军集结的原野，包围其右翼，将之围困于布尔诺城内，并切断法军能往维也纳的退路。

拿破仑也将重兵设于普拉钦高地，另外，以一个师的兵力防守狄尔尼兹和索科尼兹地区。法国的援兵第三军团已进至莱格伦附近，逼进奥斯塔利兹。

拿破仑抓住俄奥联军正面和左翼兵力较厚的特点，将少数兵力右翼防御，牵制俄军；主力则部署在中央和左翼，成梯次配置。拿破仑拟暂放弃普拉钦高地，分散俄军兵力，然后乘隙出击。当时有人反对拿破仑的这一计划。然而这正是拿破仑的高明之处，因为如果法军坚守高地，联军势必在12月1日全力攻取，提前一天大战，而这时法军后援未到，难于决战。同时，普拉钦居高临下，俄军不便向法右翼迂回分兵，而可能集兵于高地正面，从而形成硬打硬拼，硬打硬拼对人数少的法军是很不利的。

果不出拿破仑所料，俄军占领普拉钦高地后，就准备分兵迂回，压迫法军右翼，试图切断法军同维也纳的联系。12月2日晨，亚历山大一世前往普拉钦高地，视察部队。这时，广阔的原野上弥漫着浓雾，对方军队行动无法看到。战争形势扑朔迷离。库图佐夫忧心忡忡地眺望远方，而亚历山大一世却兴致勃勃。他问道：“您不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吗？”独眼老将军库图佐夫微微一笑，小心翼翼地答道：“既是陛下在指挥作战，谁还怀疑胜利在握呢？”如果沙皇此时得知拿破仑的打算的话，也许他也不会那般自信了。

法军诱使俄军分散兵力后，凭借有利地形以万人抗击和牵制了联军4万余人；而在中央及左侧，则以近6万之众对联军4万，形成主要方向上的优势，以利中间突破。12月2日早晨7时许，浓雾散开，整个奥斯塔利兹平原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在拿破仑眼中，普拉钦高地才是整个战役的关键，

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就要以他的坚兵利炮、去摧毁联军的大军了。俄奥联军倒霉时候就要到了。

此时，俄奥联军撤出了普拉钦高地。在 7 时 30 分，法皇拿破仑命令苏尔特军团乘隙夺取这一战略要地，8 时，法军由般维兹以北地区猛烈攻击前进。库图佐夫企图增援普拉钦，然而俄军四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中午，苏尔特军团夺取了普拉钦高地。拿破仑命令在高地上布置炮火，将俄军置于火炮攻击之下。到此时，胜负实际上已经很明朗了。法军已经占领了有利形势，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法军的炮火从高地上密集地射向联军，打乱了俄奥联军的阵线。法军扑向敌军，顺势攻击其左翼和背后，并切断了俄军主力与侧后的联系，使之腹背受敌。1 小时后，联军便溃不成军，俄国士兵被打得节节败退，混乱不堪。他们惊慌失措，只顾逃命，军旗摇摆，刺刀歪斜，后撤的人流越来越汹涌，淹没了高喊止步的军官，伤员恳求救援，无人置理。四下里到处是逃兵败将。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可谓狼狈极了。在混乱中，他力图保持镇定，他的左右侍从中有几个人坐骑中弹，就倒毙在他眼前。一颗炮弹落在他不远处，溅起的土块打中了他的面部。

在苏尔特军团攻取普拉钦高地时，法军右翼被俄奥联军有所突破，联军渡过了哥尔德巴哈河。但在 9 时许法军达乌第三军团赶来支援，予以有力阻击，终于转危为安。

薄暮时分，亚历山大一世离开了炮火隆隆、火光闪闪的战场，策马退向行辕，他身后只有一两名侍从。精疲力竭的沙皇几乎连坐骑都难以驾驭了。此时，俄奥联军已全线溃退。

1805 年的奥斯塔利兹战役，法军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击溃俄奥联军 10 万人，俘虏了 20 名将军和 3 万名官兵，缴获大炮 120 门。奥斯塔利兹战役在军事史上影响巨大。

奥斯塔利兹之战，由于法、俄、奥三国皇帝均在军中指挥督战，故人亦称之为“三帝会战”。12 月 26 日，拿破仑同俄奥联军签订了《布列斯堡和约》。根据协议，俄国部队立即撤出奥国领土；奥国将其在德意志施瓦本境内分散的小块土地，让与法在德之盟友符腾堡与巴登；奥赔偿军费 4000 万法郎等。

1805 年 12 月 9 日，亚历山大一世在荷利茨最后一次同前盟友会晤，然后就沮丧地踏上返回圣彼得堡的大道。行前，他给普鲁士国王写信，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永远准备竭尽全力支持她（普鲁士），我个人甚至也愿听命于她。”普鲁士原本准备向法国宣战，此时竟转而祝贺拿破仑的胜利，并同法国结盟；将莱茵河左岸克累弗和威塞尔两地及瑞士的纽沙特尔让与法国；普对英封锁海岸以换取汉诺威等。

拿破仑在接受普国使者的祝贺时，这样说道：命运之神把您祝贺的对象改变了。

俄奥的失败对于殚精竭虑组织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英国来说，无异于也是当头一棒。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认为，法国皇帝拿破仑现在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半个欧洲，他不可能长期抵御扩大霸权的诱惑。俄罗斯若不甘心向这个“头戴皇冠的科西嘉人”（指拿破仑）称臣，那么就必须尽早恢复其军队，寻求新盟友并加强与原先盟友的联系。为此，亚历山大通过涉外使节的频繁交涉，不断

结盟。他始终没有忘记积极备战，他确信有朝一日将再与法兰西一争高下。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世界四大宗教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佛教在中国已流传近 2000 年。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生活习俗等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能真正理解佛教内容及其影响的人并不多。什么原因呢？一是佛教经典浩若烟海，其理论深广；二是佛法又是建立在自身修行实践基础上，因此能把佛教的内容搞清楚确非易事。

（一）佛祖释迦牟尼与佛教

在 2500 多年前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发生了一件大喜事，净饭国王在 50 多岁时喜得太子。净饭王早年与天臂城善觉长者之女摩耶结婚，摩耶夫人温和贤淑，夫妇恩爱美好，但却一直膝下无子女，现在喜得贵子，真是天大喜事。这一天是我国农历四月初八日。

太子姓乔答摩，取名为悉达多，他就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太子长大以后，虽然勇武聪慧，但性情却喜沉思，有一次同父亲远游，看见农夫，脸向黄土，背朝天，在烈日照射下耕作，耕牛不时遭人鞭打，田中小虫被鸟雀啄食。看到自然界这一幅幅生存争斗，太子心中感到无限哀痛。又一次太子独出游玩，先看一老者，白发满头，骨瘦如柴，手持拐杖，行动十分困难，其后又看见一个有病的人，身瘦腹大，痛苦呻吟，又遇一队人抬着死去的人痛哭，看到这些，太子感慨万千，想到世人不论贵贱贫富，都逃不过生老病死，叹息道：“日月易过，少年不常，我虽富贵，岂能独免，念及将来，甚可畏惊”。

此后太子常为如何安身立命，解脱众生的痛苦问题而沉思，最后下定决心，放弃了太子的荣华富贵地位，舍弃了爱妻娇儿，而出家学道。净饭王知道后，无限悲哀，便派大臣们去追劝太子回国。他们追到太子，但太子立志修行，不为所动，与陈桥如等五人坚定地去了。

当时印度有许多出家苦行的人，有人用火烤自己，有些人则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认为今生让自己身体受苦，死后就能升天。太子分别参加了这些外道修行方法，乃至在苦行时每天只进一粒麦。少吃少睡这样苦心修炼了 6 年之久，但是还是没有得到解脱之道。因此感到只靠苦修并不是解脱之道，于是又开始吃饭，陈桥如等人看到这样，以为太子退转修行的决心，于是，就离开太子到波罗奈国鹿野苑中修苦行了。

太子体力恢复以后，自己来到尼连禅河外 10 里远的一棵树下，这棵树就是菩提树，在一块大石头上打坐，发誓说，“不成正觉，誓不起座。”在第 49 日的早晨，见到启明星出现而豁然大悟，认识了宇宙人生的真谛，找到了解脱众生、生死苦痛的方法，成了无上正等正觉，其后即称为释迦牟尼佛。释迦是太子所在的族名，牟尼为寂默的意思，释迦牟尼的意思，专指无上正等正觉。佛教弟子常称释迦牟尼佛为世尊。传说当日是我国农历的十二月初八，佛教就把这一日作为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传说那一日由于长时间的刻苦禁欲，太子感到自己虚弱得有如随风飘荡的一片草叶，他的形体枯干清瘦两眼深陷，只剩下一副摇摇欲坠的骨架而已。

一天，他觉得格外饥饿，腹中有如石磨碾转一般，难受得几乎要窒息，他走下尼连禅河，想用水滋润一下焦干的双唇，但是，水面上跳动的阳光令他头晕，他跌倒在河边，昏迷过去。

不久，一个在河边草地上的牧羊女发现了他。看见他枯瘦如老树的身体，

她心生同情，便捧出用新鲜乳汁煮成的米粥喂他。一阵清凉的柔风拂过他的面孔，他仿佛见到一层水雾，恍惚中他似乎见到了耶输陀萝如清泉般幽静的面庞，如新月般梦幻的眉尖。他欣喜着，却又觉得自己虚弱异常，好象随风飘落的片片枯叶一样。

“你的身体十分虚弱，还是先休息一番再来吧！”牧羊女又给了他一些甜美的乳汁，太子慢慢喝下。这时他已完全清醒，耶输陀萝的影子在他面前消失，他发现了跪立在身旁的长发披肩的牧羊女。他为自己虚弱而羞愧。他缓缓地立起。他象做了一个漫长而不可思议的梦，现在他已完全清醒过来。是的，一个人岂能仅凭藉着禁食，去平息灵魂的骚乱呢？以后每年农历十二月八日纪念释迦牟尼佛成道，这一天佛教弟子们总要用这种杂谷熬的粥作为供养，这种风俗逐渐流传为民间的“腊八粥”。

世尊悟道后，首先前往鹿野苑为陈桥如等五人说法，世尊讲道：人的一生是很苦的，要经受生、老、病、死等痛苦，纵然有短暂的快乐，但是荣华富贵不可常保，恩爱眷属终当别离，很多时候却是快乐一走，烦恼就来，可谓人生所爱都是苦。人生所受的苦是由已经造成的恶业集聚而引起的。我们必须灭除这些恶业，灭除贪欲，以达到解脱，生死苦恼的涅槃是可以由修道得到的。这就是佛教中的苦、集、灭、道四圣谛。世尊这次说法在历史上称为初转法轮，陈桥如等五人就成为佛教最早的弟子，从此佛教正式创立。

世尊不久又行走各地，有很多人受他的教化而相继皈依了佛教。

皈依佛教是指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的意思就是全身心归向它、依靠它，皈依了三宝的人就成了佛教弟子。佛教弟子分为出家和在家两类，在寺院和尼姑庵中的僧尼称出家弟子。在家自行修行的人，称为居士。不管是出家男女或在家修行的男女统称为四众弟子。

在家修行的弟子，要受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吃酒、不妄语，这是佛门的五条基本大戒，之后还可以加受其他的戒律，而出家僧尼则要接受更多、更严格的戒律，持守清规戒律的目的，是帮助修行，即修正自己的行为。所谓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择言语，不去讥讽他人过错。

释迦牟尼佛讲法共 49 年，谈经 300 多次。当他在世圣寿 80 岁的时候，就在拘尸那伽罗城外的希连若跋提河畔不疾而终。在公元前 544 年，我国农历二月十五日的中夜月圆时分，世尊在罗双树间右胁而卧，进入涅槃。后来众弟子把世尊的圣体在拘尸那伽罗城中火化，所遗的舍利分别由摩揭陀等八国供奉，供后来弟子膜拜。我国北京八大处佛牙塔供奉着佛牙舍利。1987 年在陕西扶凤县法门寺发现了佛指舍利。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教弟子们继续弘扬佛法，使佛教逐渐传入中国、日本、东南亚等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 5 亿人口信奉佛教，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没有正式皈依佛教，还不能算是佛门弟子。

据说，在我国汉明帝时代的公元 67 年，佛教传入我国。据《资治通鉴》记载：“起初汉明帝听说西域有神，称为佛，就派人去印度寻求佛法，带回了一些梵文佛经和印度僧人。”这些佛经是用白马驮回来的，后来在洛阳西雍门外建立寺院，就称白马寺。翻译佛经的工作最早开始在白马寺，翻译出的第一部经为《四十二章经》。

佛教的经典分为经、律、论，也就是常说的三藏，是释迦牟尼佛逝世后佛教弟子们搜集的。佛所说的法称为经，佛所制的戒律称为律，佛门弟子对教理的解答、研究的论著称为论。藏的意思同宝藏。汉明帝以后，西域的译

经大师一一东来，宣讲佛经、教义，我国有志于佛门的人士也相继西行求法，于是，佛教就在中国逐渐流传了。到西晋时代，鸠摩罗什大师来到中国，开始了佛经的大规模翻译工作。

和玄奘大师同是佛经翻译事业中的巨匠的还有鸠摩罗什大师（344—413年），他生于龟兹国（现在我国新疆库什），是国王的外甥。后由于母亲出家，他便于7岁随母亲皈依佛门，初学小乘，后学习大乘。在西域的各国中，很多人都崇敬他。秦国君主、苻坚听说罗什大师的事情后，就派骠骑将军吕光攻打龟兹国，他对吕光说：“如果攻下龟兹国，就迅速把罗什大师送来。”后来吕光果然攻下龟兹国，带罗什大师走到凉州时，苻坚所统治的秦国已灭亡，于是罗什大师就滞留在凉州18年。后来秦国新国主姚兴把罗什大师接到长安，请入西明阁逍遥园译经，并派僧肇等800多人协助翻译。12年总共翻译经论98部，425卷。其中重要的经论有《法华经》、《金刚经》、《维摩经》、《大智度论》等。他和玄奘确是佛经翻译中的两大巨匠。罗什大师之后，经论一直不断有人译出，如觉贤于公元418—421年译出《华严经》，昙无讖于公元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求那跋陀罗于公元443年译出《楞伽经》，真谛大师于563年译出《摄大乘论》和《释论》，564年译出世亲所著的《俱舍论》。

唐朝时佛教文化很发达。玄奘大师是唐代洛阳人，他13岁出家，后因感到一些翻译的经典中有不明了的地方、因此想去西方、寻取梵文原经，重新翻译、核准经典。玄奘大师于公元626年从长安出发，走了三年才到印度，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内，遍游印度各地，刻苦研习佛教经典，访问各方有名学者。玄奘将回国时，统治中印度的戒日王，早听说玄奘辩才十分出众，就想一试真伪，一日招集佛教僧人及婆罗门学者5000余人，按照印度风俗，请玄奘为论主，提出一个辩论的主题，任人辩论。经过18天时间，无人能攻破玄奘的论点，获得“大乘天”（也就是大乘佛学的权威）的称号。之后于公元645年，满载着荣誉和友谊回到长安，带回梵文贝叶经520夹，总共657部。当时有数十万人的僧俗出来夹道欢迎。唐太宗皇帝也十分赞赏。从此之后，玄奘法师就在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工作，前后19年内，共译出重要经论74部，1335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西游记》中把玄奘法师称为唐僧或唐三藏，是指唐朝的僧人或唐朝的三藏法师的意思。精通经、律、论这三藏的法师就称为三藏法师，例如鸠摩罗什大师也是三藏法师。《西游记》中说我国唐朝以前无大乘佛经则不确实，实际上，在我国流传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经。

翻译佛经工作从汉明帝时期开始，至宋代基本结束，共译出经、律、论三藏1690部，6420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国来的译师不下200人。其中的玄奘、法显、义净等大师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舍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也曾著说赞扬他们。另外，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佛教除了在汉地流传外，在西藏等各地也都广为流传。自公元8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的五百年间，西藏译出的经籍有5900余部，相当于汉译的1万卷，并且重复翻译的经籍很少，因此实际内容大大超过了汉译经籍。佛教弟子对佛教经籍常作难见难遇之想，在阅读念诵前，先净手洁案，并诵念开经偈（音计）：“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

历代统治者，对佛教传入我国近2000年内的起伏、波折有着深

刻、直接影响。他们中有些人大力推崇佛教，有些则严厉禁止佛教。然而，佛教早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深深结合，不论是否信仰佛教，生活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通过回顾佛教的发展历史，使我们能以正确的态度认识佛教。

（二）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

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在这之后的三百年中，佛教的主要工作是翻译经典，佛教弟子也主要局限于出家的僧人。经过三百年的译经和传播，直到晋代才取得社会人士的普遍信仰。其中道安大师（公元312年—385年）对佛教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也可说是中国佛教划时代的人物。道安大师之前，译经和弘教主要靠外来的西僧，大师出道之后，我国本土的僧侣开始成为弘法的中坚，这样佛教才得以在社会上流传。

自道安大师之后，佛门又出了两位杰出的人物，在南方有慧远，他是道安大师的入室弟子。北方有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到了南北朝时代，在南方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热心于佛教的梁武帝。鸠摩初来我国时，梁武帝在会见他时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剃度众僧，其数不可胜数，有什么功德呢？”由此可见梁武帝对佛教提倡以及佛教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北方到魏太武帝时，他起初也信佛教，后来听信了一些人对佛教的诽谤之词，借口僧人不守戒规，而下诏坑杀境内的僧侣，破毁经典佛像寺庙，这就是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厄。5年之后，魏武帝之孙文成帝继位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距魏太武帝发难110余年后，至北周武帝时，佛教再遭第二次厄难。周武帝起初也信佛教，但后来也是听信旁人之言，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佛像，命令僧人还俗。但不久周武帝就死了，继位的宣帝，再次恢复佛教。到了隋唐统一时代，从隋文帝到唐武宗前的250年间，佛教进入了黄金时期。隋文帝杨坚一生大力提倡佛教，下诏天下人听任出家，并令各地出钱营造经像，以至当时佛经的流传布道多于儒家教书数十倍。到了唐太宗、高宗之时，又出现了贤首、道绰、善导、玄奘等杰出佛学大师。此时我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即天台、华严、法相、俱舍、律、禅、净土、密这八宗已基本形成，全国的寺院达到5300多座。

会昌五年，唐武宗时，以僧人不参加生产为理由下诏毁寺逐僧，共毁佛寺4600余座，勒令26万僧尼还俗，这是“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三厄，一年以后武宗死，宣宗即位，下诏恢复佛教。然而当时已届唐末，国势渐衰，许多经籍已全被焚毁，各宗都难以恢复。

禅宗本来不立文字，不依经典，所以社会条件一好转，就迅速恢复起来，形成了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这五家禅宗门派。到了五代之末，周世宗柴荣性不喜佛，即位不久，即以铜钱短缺为名，搜刮铜像、铜器等用以铸钱，并废毁了许多寺院，这即是“一宗之厄”。佛教经过这次劫难后，更趋于衰微。陈桥兵变，宋太祖代周而拥有天下，下诏示于各地，恢复佛教，度僧建寺。至宋太宗时，雕版刻印了第一部大藏经，名《开宝藏》。以后到元朝灭宋而统一中国，推崇西藏的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以藏密为主），使汉传的佛教受到压抑。明太祖朱元璋，少年时曾入皇觉寺为僧，即位后对佛教颇尽保护。然而到此时，隋唐时诸宗已多半失传，禅宗也仅剩了曹洞、临济二宗尚存。到了明朝末年，出了明末四大家，即莲池（名殊宏），真可（名紫柏），德清（名憨山），藕益（名智旭）四位大师，或提倡净土，或提倡禅净双修。满清入主中原后，亦崇信喇嘛教，但同时也能保护汉地佛教，顺

治和雍正二帝都曾致力参究禅宗。至清末民初，佛门又出了谛闲、印光、太虚、虚云等诸大师，对近代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现在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繁荣昌盛，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开始恢复和发展。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说：“抚今思昔，我深为中国佛教庆，深为中国佛教徒庆。我深信，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

（三）佛门看宇宙、人生

佛法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人们所说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是指出世间。释迦牟尼为解脱人生的苦难而出家修道，最终成道。他在讲法时常说：“法尔如是”。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所讲的法只是指出了他所发现的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由他创造或制定出来的。那么人生的真谛、宇宙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在探索这个问题。这里我们把佛教的宇宙人生观向读者做个简要介绍。

现代科学指出“人死如灯灭”，也就是说当人死后，脑细胞停止了活动。人类是具有思维意识的生命体，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的统一体，人死之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只是人的色身（即组成人的物质方面的地、水、火、风四大因素）分散了，此时精神方面的神识脱离了肉体，而神识仍然是有意识的，神识就是人们所说的灵魂。所以死的只是人的肉体。不但人有神识，而且畜牲也有神识，这就是佛门戒杀的理由。除此之外，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中，还有四种有神识的生命，合称为六道，即：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牲道、饿鬼道、地狱道。前三道称为三善道，后三道称为三恶道，这六道之内的生灵都称为众生。六道轮回就是说众生死后，神识再投生于这六道之中，总是在这六道中生死轮回。人们常说人死后做鬼，然而依照佛教的观点看，人死后并不一定去做鬼，神识与我们所说的鬼并不是一回事。佛教要求众生脱离六道轮回的原因，是因为众生在这六道内受着各种苦，可谓剧苦极刑。

简而言之，人间有八种苦，分别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生老病这三苦大家都有常识，死苦大家今生虽没经历过，但如果看过一些临死的人痛苦呻吟的样子，也就能想象人死时的痛苦了。人死时如同活牛剥皮，生龟脱壳，要忍受地、水、火、风四大分离之苦，这个苦是很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这个死苦不是只死一回，而是生生死死没有尽期的。另外是怨憎会苦，自己碰到人，总是常常给自己找麻烦，越是可怨可憎的人越是躲不开。再有爱别离苦，就是跟自己谈得来的，有感情的、恩爱情深的人，偏偏不能相处长久，往往生离死别，苦不可言。还有求不得苦，想得到的就是得不到。即使第一个欲望得到了，第二个欲望又立即生出来了，山谷易满，人欲难平。人总是在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有一少一，思欲齐等，适小具有，义忧非常。”就在这患得患失中度过一生。最后是五阴炽盛苦，这是前七种苦的根源，当色、受、想、行、识这五阴，象火一样炽烈燃烧起来时，便使人迷失掉自己的本性，而造出各种事情，从而受前七种苦，人的这八种苦辗转相生，循环不断。至于畜牲的苦是人所共知的，互相吞食，忍饥受饿，为人驱使，任人宰割。饿鬼则常受各种饥渴，所见食物皆成火炭，所受痛苦甚于畜牲。地狱之苦，则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有详细描述。地狱有苦多种，最苦者为无间地狱，罪人在此受抽肠拔舌、油炸火烧等种种诸苦，动经亿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日夜受罪，无时间断，一

日一夜，万死万生，只到业尽，方能得出。罪业深重者死后便入地狱。

佛教中也有讲在天道中的众生则可享受各种快乐。天道共分为二十八层天，第一层天叫四天王天，由四大天王主管。第二层天叫忉利天，这层天的天帝叫释提桓因，就是人们所说的玉皇大帝。再往上三至六层天为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在这六层天的天人种种享受，但还有情欲，身体也有形色，合称为欲界天。欲界天再往上的十八层天称为色界天，色界中的天人已没有各种情欲，但仍具有色身。色界再向上的四层天称为无色界，其中的天人已经没有情欲和色身了。天的层次越高，其所享受的快乐也越大，寿命也越长。修罗道是一种鬼神，这种鬼神也有很大的福报，只是嗔恨心很重，经常相互争斗。有时也把修罗道合在天道和饿鬼道中，把天、人、畜牲、鬼、地狱称为五趣或五道。

从上边所讲，六道内的众生苦乐相差悬殊，至于众生死后能投生何道则以所做的业而定、修善之人死后可投生于天道、人道或修罗道这三善道中，而做恶的人则将堕入恶道。天界的福报很大，但佛教认为，升入天道也没能得到根本解脱，这是因为天上的天人寿命虽然很长，但终究是有限的，这一点和民间认为神仙可以长生不老的观点不一致。实际上，我们每个众生都在这六道之中经历了无数次轮回，享受过天上的快乐，也忍受过地狱之中的痛苦，就像车轮一样上下旋转不停，所以天人与地狱实际只有一步之隔。因而只有脱离这六道轮回才能得到彻底解脱，获得永久的快乐。脱离六道的方法就是依照佛法修行，而唯有在人间才最适宜学佛。这是由于恶道中的众生或身受剧苦，或愚痴蒙昧，而无力学佛。天道中的天人身受诸乐而无心学佛。人则既有解脱痛苦的愿望，又有学习佛法的能力，不过，即使获得了人身，也不一定能听到佛法。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所讲佛法在人间共能流传 1.2 万年，之后的众生就听不到佛法，要等到近千万年以后弥勒菩萨下生到人间成佛时才能再有佛法，所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四）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宗和密宗

佛教认为，人在禅宗中就可获得神通，能见到天界、地狱等常人所见不到的东西。脱离六道轮回。

禅宗追求的是开悟，悟就是见道、见性。这种开悟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也不是逻辑思维所能想清楚的，比如有一个天生的盲人，很想知道白色是什么，有人说就是白纸的颜色，也有人说是白天鹅的颜色，又有人说是白雪的颜色。众人用了很多事物向他比喻，于是这个盲人感叹道：“白色真是太复杂了！”禅宗的禅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感受，是一种“会心的微笑”。另外，禅宗讲不立文字，这并不是说修习禅宗就可以不学佛教经典了，只是说不能执著于文字本身。比如我们用手指向空中的月亮，我们的手指本身并不是月亮，但是顺着手指的方向却可以看到月亮。

《六祖坛经》是修习禅宗主要依照的经典。除此之外，还有记录禅师言行的语录，主要有《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指月录》等，研习各种语录时，如有钻研不通之处，就疑而参之，这就是禅宗的参论头。参论头是禅宗的一个基本修行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心念集中在一句能使人发生疑情的话上，极力参究，力求透脱，忽然至一切妄念照破、洞见心性、而立地悟证。常参的论头有：“如何是祖师东来意”，“念佛是谁”，“如何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等。修习禅宗需要有名师指引，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点透。然而自元明以来，禅宗已经逐渐脱离了“不立文字”的真意。或者死参一句

论头而不能透悟，或者大讲语录公案，高谈玄理，使“不立文字”的禅宗反而变为“口头禅”。《金刚经》中讲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

我国汉地密宗是在唐朝兴起的，在唐玄宗时期“开元三大士”东来，密宗得以兴盛，首先是中印度的善无畏于唐玄宗开元三年抵长安，玄宗拜他为国师，先后译出密宗经典多种。在善无畏到达长安的第四年，又有金刚智带弟子不空乘船来华，在开元八年到达洛阳，在洛阳至长安一带广弘密教。密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等。在修习时通过口持咒，手结印，意观想来调整身口意三业，使之与本尊的身口意相应，这样就可以迅速得到智慧、神通乃至即身成佛。本尊是指修学者自己所选择的一尊佛、一位菩萨或者一位明王。修习密宗须由轨范师亲口传授，并经过灌顶才可以修习，不得任意传授旁人，故称密宗。汉地密宗到明代就失传了，现在汉地的密宗是从藏密宗引入的。

我国藏族及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都是以密宗为主。密宗的一个主要修行方法就是持咒。按照世尊说，密宗所咒的经典《楞严经》，已列入僧人所做的早课中。按照佛经说，诚心念这个咒的人，有菩萨金刚神等保护，所有恶鬼邪恶，一切毒虫、毒物都不能害他，情欲心重的人可以使得欲心渐渐的消灭。现在寺院中常念的咒除了严咒外，还有大悲咒，十小咒等。因为咒的威力很大，所以常称为神咒。咒语都是按梵文（即古印度语）的读音翻译的，而不像佛经是按经文的意思翻译的。例如楞严经第一句为“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楞河帝三藐三菩拖写。”念咒时只须把音读准即可，就好像军营中的口令一样，答音对即可通行。由于篇幅有限，不多介绍了。

净土宗在我国的初祖是东晋时代的慧远大师（公元334 - 416年），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123名僧俗弟子创立念佛莲社（因往生后莲花化生，故称莲社），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兴净土宗风。当时朝廷权贵、文人名士都倾服他的道德学问，书信往来不绝，关系极为密切。由于当时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提倡护持，净土宗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其后，唐初的善导大师，致力于弘净土法门，从此不仅中国，而且播及朝鲜、日本等地。

修习净土宗的人，必须具备信、愿、行，称为净土三资粮。信就是要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愿就是愿意去，行就是念佛修行。在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的人中，有几种情况。其一是深信释迦牟尼及世代高僧所说，因为佛教中妄语是一条根本大戒，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必然真有。其二是许多修习净土宗的人临终时预知时间已到，就或立或坐，随意往生，瑞相非凡。临终前说已见阿弥陀佛及很多圣众来接。死后或异香满室，或神态如生。《龙舒净土文》记载有慧远大师及刘遗民等人的往生事迹，临终前数日即见佛与圣众来接，慧远大师并见到莲社中已先往生的慧持、慧永等人同佛一起来接。其三，一些半信半疑之人，通过念佛修行出现了各种感应，因此坚定了信念。如唐善导大师弟子怀感有疑，大师对他说，“你只要一心念佛，就会验证。”后怀感坚持念佛三年，果然证验，后来写了《决疑论》。

有了信后，就要发愿，发愿的关键是切愿，切就是一心一意往生。如果三心二意，既愿意往生，又舍不得眼前的名誉地位，恩爱情思，那么往生就困难了。

有了信、愿后，所需就是念佛修行，通常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佛）或阿弥陀佛（四字佛）不间断地念，每日念诵几千乃至几万遍。所以净土宗

又称为念佛法门。净土宗以其修行方法的简易，而广泛流行于民间，不论男女老幼及文化学识程度，出家居家者皆可修行。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内容多、渊源深，这里只是简要介绍一点。

康熙大帝与清朝的巩固

康熙是清朝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在位的 61 年（1662—1722）期间，清朝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康熙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作为是因为他的活动符合了时代的要求。17、18 世纪之际，中国各族人民备尝长期战乱不宁，生产停滞，社会萧条，民不聊生之苦，因而产生了要求统一和安定的愿望。康熙本人处于当时形势下，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获得胜利。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好局面。这个好局面一直持续到乾隆朝、历史上称“康乾盛世”。

康熙本人的思想和作风也和他的事业成就有着密切关系。从他一生活动看，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总的说来，康熙的功远远大于过。

康熙，名玄烨，姓爱新觉罗，满族。他的亲祖母是蒙古族，生母是汉族。康熙皇帝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自幼聪明好学，立志做一个贤明的帝王。6 岁那年，有一天他和哥哥福全等人一起去给父亲请安。顺治皇帝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做什么样的人。福全说：“愿意做一个贤王。”玄烨说：“愿意效法父皇做一个好皇帝。”他小小年纪便说出这样的话来，使顺治皇帝十分惊异。

玄烨 8 岁那年（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病死了。临死以前，他指定玄烨做继承人。因为玄烨年纪太小，还不能料理国家大事，顺治皇帝又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个人做辅政大臣。这四个辅政大臣都是上三旗的贵族。按照满族习惯，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皇帝统辖，称为上三旗。上三旗的臣民是皇帝的私人奴仆。顺治皇帝鉴于以前多尔衮专权的教训，把儿子托付给了四个忠心耿耿的奴才，便觉得十分放心了。第二年，玄烨登上皇位，宣布建元康熙。小皇帝年纪太轻，朝廷大权都掌握在辅政大臣手里。

本来顺治皇帝在位的时候，根据汉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宣布停止圈地等等。可是四个辅政大臣曾经从圈地中得到好处，所以反对这些改革。顺治皇帝死去不久，他们就重新圈占了土地。他们还恢复明末加派的练饷，每年向人民多征收几百万两白银。

在四个辅政大臣当中，鳌拜是最跋扈的。他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国家大事多是先在家里商量好了，再拿到朝堂上宣布。康熙六年（1667 年）小皇帝 14 岁了。按规定宣布亲政，但有名无实，大权仍掌握在鳌拜手中。其他三辅政，索尼已死，苏克萨哈就在亲政的当月 7 日被鳌拜诬杀，遏必隆为人怯懦，凡事屈从。于是鳌拜在朝把持大权，飞扬跋扈，独断独行，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年轻的皇帝。康熙帝要想奋发图治，那就非搬开鳌拜这块大绊脚石不成。康熙捉鳌拜是一次带有戏剧性的行动。因为鳌拜在朝中党羽众多，不能硬下手。于是康熙把自己装作一个好玩的青年，天天和一群同自己年龄相近的侍卫在一起练习摔跤，不太过问政务。鳌拜因此便更加放心。一天，趁鳌拜入朝之际，来了个冷不防，突然下令捉鳌拜，这群小伙子一拥而上就将他捆绑起来。然后宣布鳌拜 30 条罪状，软禁终身。这件事全仗着康熙沉着、机智、勇敢，具体捉鳌拜的过程是这样的。

康熙首先找了一群年龄跟自己差不多，体格健壮腰腿灵活的少年。从此，康熙皇帝每天和这些少年侍卫练习摔跤。鳌拜进宫办事，他也毫不在意，照

样玩得热热闹闹。鳌拜见了，感到好笑，心想：“这群孩子，真是淘气。”就更不把康熙皇帝放在眼里了。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5月的一天，鳌拜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还放出风声，说皇帝应该到他家去探望。康熙皇帝听到风声，果然亲自到了鳌拜的家。他刚走进鳌拜的卧室，就见鳌拜神色十分紧张，双手按住床沿。一个御前卫士快步走上前去，揭开床席一看，原来下面藏着一把利刃。鳌拜更紧张了，谁知康熙皇帝笑着摆摆手说：“刀不离身，这是满族的习惯，不必介意。”说罢，他详细地询问了鳌拜的病情，便起身回宫去了。鳌拜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天之后，康熙皇帝得知鳌拜要进宫奏事，就把那些每天跟他摔跤的少年侍卫叫到身边，康熙皇帝激动地站起来，高声说：“鳌拜作为辅政大臣，违背先皇的重托。他毁弃祖上定的国法，处处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擅杀大臣。国家大事，他都是在家里商量好了，才向我启奏。这样下去，我这个皇上就被他架空了。大清朝立国不长，照他这么专权，大清国还有希望吗？”他又放低了声音说：“你们虽说年纪轻轻，可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要靠你们除掉这个奸臣！”侍卫们听完，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叫起来：“听皇上吩咐！”康熙高兴地说：“好！等会儿鳌拜来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过了一会，鳌拜进宫来了。他象往日那样，大摇大摆地走着，还没等站稳脚跟，康熙皇帝便使了个眼色，那伙少年一哄而上，将他推倒在地。鳌拜本来身经百战，是一个受过“巴图鲁”（满语“英雄”的意思）封号的武将，号称“满洲第一武士”，可是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还以为小孩子跟他闹着玩呢！等他看清了小皇帝冷峻的面孔，才猛然醒悟过来：皇帝已经对自己下了手。然而，已经晚了。那群年轻的侍卫，现在已经捆住了他的手脚。

当下，康熙皇帝召来了议政王和大臣，命令他们审讯鳌拜。议政王和大臣们平日都痛恨鳌拜的专横，一桩桩地列举了鳌拜欺君枉上等30条罪行，一致要求将他处以死刑。鳌拜听说要把他处死，也顾不上什么君臣之礼，在朝堂上一把脱下上衣，坦露出身上伤疤，说：“这都是老臣跟随先皇打仗留下的呀！”康熙皇帝点点头，说：“念他效力年久，军功显著，免死。”于是，鳌拜被终身监禁。他的死党则被一网打尽，处死的处死，判刑的判刑。

16岁的康熙皇帝机智地擒拿权臣鳌拜，扫除了他自己掌握朝政的一个大障碍。

康熙皇帝指出，国家必须统一，大权不可旁落。为此，他全力解决一个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问题，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的强盛。

权臣铲除，朝政刷新，从康熙九年（1670年）起，展示出一种振奋有为的气势和宏图。

过了三年，三藩事件爆发。康熙领导朝廷上下进行统一的斗争。三藩事件早在康熙预料和预计之中。三藩是三个被封授王爵的明将，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清政府使用他们率兵进攻南明，由此得以坐镇一方，吴在云贵，尚在广东，耿在福建。他们在名义上隶属中央，实际各拥重兵，干涉地方，形成割据。再加上和他们互通声气的一些汉籍将领，其兵数的总和超过八旗部队，成为清政府的严重威胁。

康熙正在寻找解决三藩的机会时，尚可喜上疏表示告老还乡，让儿子尚之信袭爵。接着吴三桂、耿精忠也作出同样的表示，来试探朝旨。有了这个机会，康熙便抓住不放，立刻作出决定：将三藩全撤掉，并且不准尚之信袭爵。这一来，吴三桂首先揭起叛旗，耿精忠继而响应，尚之信也反了，其他

与吴素有联系的汉将也都反了，一时战火燃遍长江以南半个中国。

三藩事件爆发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20岁。他面临此事，毫不惊慌，派兵遣将，从容应付。他的战略是：“先保住湖北，以安定军心，”然后派兵进入江西，这样就可以截断吴、耿的退路。不久陕西提督王辅臣受到吴三桂的引诱叛变。康熙对王辅臣采用军事政治两结合的策略，而以招抚为主，尽管他一再叛附不定，并杀害了朝廷命官，仍予宽容，最后把他争取过来。从此便可以集中力量应付南方。康熙很能拉拢汉族将领，西北将领如张勇、赵良栋、孙思克、王进宝等均对他忠诚效力，在三藩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康熙还善于使用降附的汉将，康熙对吴三桂的少数民族兵笼络得也很好。

平定三藩共用了八年时间，最后获得胜利。这一战役始终全靠康熙运筹指挥，充分显示出他的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之后，全国实现统一，官吏遵行政府命令，军队调动受到约束，进入了有秩序有纪律的国家轨道。

接着康熙着手处理台湾问题，争取台湾郑氏归附大陆。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康熙在长时期指挥作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平定海疆，争取台湾，非重用汉人不可，因为他们熟悉沿海情况。于是康熙选出两个本领出众的人来，一是会稽县人姚启圣，一是泉州人施琅。就以姚启圣作福建总督，他善于从事招抚工作，郑氏势力逐渐受到削弱，沿海地带从而取得安静。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成功长子）死，内部矛盾重重。康熙认为取台时机已到，派出施琅到福建担任水师提督，康熙对施琅完全信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由施琅率兵出发，经过澎湖一战，即顺利地开进台湾。在这一事件中，充分证明康熙知人善任的才能和魄力，他能够放手使姚、施二人都得以各展其长，各尽其能。

统一台湾之后，当时对台湾的善后措施，清政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设置府县，加强管理；另一种则主张放弃不要，甚至想把它送给荷兰。康熙采纳了前者的意见。康熙的这种坚定态度对于完成中国统一具有重大关系，是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的。从此祖国神圣领土台湾，隶属于清政府之下。

从16世纪末，俄罗斯即开始向东侵略，占有西伯利亚，随着又侵犯我国黑龙江地区，大肆抢掠杀害当地各族人民。中国出兵抗击完全是为了保卫边疆。侵略者的企图不单单是侵扰地方和残害人民，它更抱有征服中国的野心，要中国向沙皇纳贡称臣。

康熙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对俄罗斯进行军事防御措施。第二年俄人占据我国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中国军队在康熙亲自策划和指挥下，集结八旗和蒙古骑兵、福建藤牌兵，以彭春为统帅，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攻克雅克萨城，夺救回来被掳走的百余户人口。第二次作战又获胜。俄方提出求和的要求，康熙答应了它的要求。于是在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688年8月27日）经双方签字缔结了《尼布楚条约》。为使俄人来华贸易停留和贮货方便，将原定以尼布楚为界改为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正是我国一向对外采取宽让政策的具体表现。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对北部蒙古突然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连占三部地，北边一时大乱。康熙闻讯，立刻下令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独石口、张家口粮仓接济逃难的蒙古人民，并发给银两、布匹、茶叶等物，

又补给了牲畜，把他们妥善安置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八年之后，战事结束，喀尔喀人民才得以重返故土。

噶尔丹十分猖狂，率兵冲到距北京 700 里的乌兰布通。京师震动，康熙迅速派兵拦截，将其打退。康熙于三十五年（1696 年）亲自挂帅分三路进讨，噶尔丹由克鲁伦河张皇遁走，被西路统帅费扬古击溃于昭莫多。第二年，噶尔丹自尽。这一战役的结果，喀尔喀全部内属，按照清制分别授予其首领封爵。从此清政府的命令可以下达全国，直到边疆。中国各民族要求统一的愿望实现了。这和康熙的英明决策，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

康熙在进行统一斗争的同时，即开始一面禁止入关后的一切虐政暴行，一面则积极谋划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在平定三藩时，财政已极感困难，增加捐税的收入远远不够用，主要还必须依靠生产发展。康熙自亲政之后，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黄河自明末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多年失修，到康熙初造成了巨大灾患。黄河与淮河互相冲激，不能合流入海，以致波及运河，漕粮受阻。更加严重的是，河水泛滥不止。南面山阳、盐城、高邮、宝应、江都、泰州、兴化等 7 个州县、田地一片汪洋。

康熙对河患是极其关心的，他对治河方案一直用心钻研。康熙十六年（1677 年），三藩战争正在进行，即任用靳辅开始治河。当时修治黄、淮、运三河，目的是疏导黄、淮合流入海，恢复运河正常航行，并使江北人民脱开水患，安定从事生产，就当时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来说，是一个艰巨难办的事情。靳辅作为河道总督，极为勤奋尽心，只用了一年的时间，7 个州县的民田都重新可以耕种了。但是，这时的治河方法，只能是筑堤束水以冲刷泥沙；开河引水，以缓和水势，谈不到根治，所以决口总是难免的。正是由于这样，朝廷大臣们对治河各持己见，争论不已。后来为了如何疏泄积水问题，靳辅和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形成对立。靳辅触及当地豪绅地主的利益，竟被免职，陈潢也牵连下狱。最后，实践证明，还是靳辅的治河方法有效。康熙曾以肯定的口气说，靳辅的治河方案是正确的。就这时的治水技术水平来讲，也只能作到这样。这样作确是收到了成效。而康熙每次南巡以视察治河工作为重点，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无疑这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以及政权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康熙还修治了浑河。此河从卢沟桥以下就经常决口，有“小黄河”之称，既威胁着北京对外交通，也成为沿河人民的严重灾害。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四十年（1701 年）竣工，改名为“永定河”。

到康熙五十年左右，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边远省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口逐渐增多，田地开垦得也越来越多。

康熙对地丁钱粮实行蠲免，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蠲免云南全年钱粮。二十六年（1687 年）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 600 万有余。从此以后，各省钱粮不断蠲免。这种蠲免钱粮是在国库充裕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军事、河工上还需要大量经费开支之下，到康熙末年国库仍饶有存储，这充分说明当时生产发展主要是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实行蠲免，并不能消除贫富分化，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总是要维护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依靠的首先是地主。所以，蠲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而阶级矛盾和斗争仍然在一步步走向激化。

康熙在其统治期间，从宫中到政府，比较能够实行节约。

康熙对宫中费用的确是注重节约的。康熙末雍正初，光禄寺吃食钱粮等项数目，每月的开支不超过 4000 两，少则六七百两，这确实是注意节约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手中虽然已无武器，而仍心存敌视，其中颇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受到人民尊重的。因此，康熙深切感到必须把这些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对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特别举行一次“博兴鸿词”考试。通过这种办法，确实网罗到一批知名之士。其中如朱彝尊、邵远平、潘耒、尤侗、汪琬、施闰章、陈维崧、吴任臣、毛奇龄、彭孙遹等，都是学问扎实，文才出众的。此外还有愿意参加因亲丧等事故不能来的，如惠周惕、曹溶、汪懋麟等。不管来与不来都被称为“征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光荣头衔。

康熙最重视那些在当时学术界具有威望的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李塨等。同时和他们持同一态度，推荐不出的，还有不少人，如万斯同、李塨、应谦、范镐鼎、冉觐祖、徐夜等等都是。顾炎武是严峻表示宁死不出来的；李颺被抬到西安后，水浆不进，绝食以拒。康熙对此并不发怒，一概包容。因为他晓得这样作，不仅不会危及清政权，相反，倒可由此减弱敌视情绪。这正是康熙运用政策的高明之处。黄宗羲的态度在康熙帝的感召下缓和了不少，后来即派出他的儿子和门人万斯同到北京参与纂修《明史》工作。举行“博学鸿词科”对争取知识分子是获得成功的。

“博学鸿词科”使得朝中重要官员特别是满洲贵族大员知道尊重知识分子。

康熙对录取的这批知识分子妥善安排，派他们担任纂修《明史》。这一着也很高明，借此还可以拉拢不愿作清朝职官，却愿为前朝修史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象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朝中高级官吏以延聘方式招致来的。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活动气氛中，将知识分子慢慢争取过来，使他们由敌视转变为亲附。

康熙在巡行中到处争取知识分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他到西安，首先问及李颺，希望能够见到他。颺推病不出，便命将其著作取来。颺派他的儿子送来所著书，康熙亲自接见。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南巡途中在德州接见著名天算学家梅文鼎。在南巡中多次接见当地知识分子，广泛地进行联系，企图在文化活动和接触中消除汉满民族间的隔阂。

康熙除利用编纂《明史》来笼络知识分子外，还扩大延揽他们从事编书工作。康熙时期编成了许多书籍，内容无所不备，有的在今天仍有研究参考价值。而他的这一作法是和他的争取知识分子政策连结在一起的。康熙认识到要想社会安定，政权稳固，必需笼络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肯于在清政权统治下受职任事；至少不再心存敌意，不再谋图反抗。他对那些隐居逃世，拒不出来作官的人，只要不作公开的诬蔑言论和反清活动，就给以宽容，听其“我行我素”。康熙之所以要这样作，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其政权的稳固。

康熙是很好读书的一个人，他的学问面颇广，对词章、声韵、历算、律吕等都有很高的水平。康熙九年命令礼部设立“经筵”制度，经筵是仿效明朝为皇帝专设的讲习《四书》、《五经》的一种制度，有“经筵讲官”。康熙对此做得最勤，就在三藩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每天照常举行经筵。他想要把儒家的一套学术理论学到手，以便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康熙极

推崇《尚书》，说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值得朕留心研究。”康熙非常相信儒家学说思想，对儒家以外的学说持否定态度，康熙是一个遵行儒术的封建君主。

康熙对政治讲究实用，他对《资治通鉴》颇为肯定，说它是一部好书，对治理国家有用。而对《左传》则不太喜欢，说这本书不切实际。康熙是善于运用儒家思想加强统治的一位皇帝。

康熙对宋朝理学家朱熹极尽恭维之能事。可是对待那些自命为理学家的臣属们，每当看到他们虚伪作态，名不副实的地方，便加以无情的揭露。康熙认为要讲理学，就须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冒充有高尚道德。

康熙在政治、军事以及法制等方面的思想，都是从儒家思想理论中发挥出来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是清朝的“祖训”。康熙勤勤恳恳地执行，而且对勤政这一条执行得最好。康熙帝认为，要使全国归于“正”，就应当使朝廷先“正”了。但是，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必须把好的提拔上来，坏的淘汰下去。不然的话，只有好的勤于职守，那坏的不受惩罚，这怎么行。康熙很知道人材难得，因此他既留心选择，更要进行考验。

康熙的一生作出了很多的成绩。康熙五十年（1711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要把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些。他常告诫地方官吏不要多事扰民，说：“与民休息，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前代君臣，经常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虚耗元气，导致全国上下矛盾重重。应该引以为鉴，不犯类似的错误”。在当时，需要恢复元气，发展生产，官不扰民，确实是一个重要条件。不过，康熙之所以重视此事，还存在着一种顾虑，即害怕老百姓造反。

康熙的军事思想也很丰富。首先，他广行招抚。对三藩、台湾及准噶尔都采取的这种策略。吴三桂，已经揭起叛旗，仍然允许认罪归附；对噶尔丹更是如此；最突出的是对待王辅臣，他三叛三附，并且杀死经略和朝廷使臣，最后对他还是免罪复职，不追究责任。用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扩大战乱和分化孤立敌人。他信任降将。施琅、林兴珠、韩大任、朱天贵等人，归附之后，或建立大功，或战死疆场。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三藩，早有精神准备，事件爆发，毫不惊慌，从容应会。对台湾，更是多年观察筹备，时机一到，立即进行。对俄罗斯的抗击，不但先派人出去侦探敌方情况；同时在瑗珲、齐齐哈尔修建堡垒，征集粮食，备足三年需用。准备充分之后，打起仗来，才有必胜的把握。

康熙在每次获得胜利时，朝臣总是奏请加上尊号，他都严峻拒绝，并且坦率地讲出道理。他先后5次拒绝给自己加尊号。在接连取得胜利之后，能够如此坚决地拒绝颂扬，在封建帝王当中还是罕见的

康熙在他64岁时说：“我这个人人生来并无灵异，长大之后，亦无非常。”又有一次对臣下说，你们总是说“皇上由天授。其实我很清楚，没有人生来就是圣贤，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康熙说：“满招损，谦受益”。一次命令大臣草拟圣旨，见其中有“海宇升平”等语，便告诫说：“象这样的浮夸之辞，以后不许再提。”这样能保持谦逊而不骄傲自满的态度，很值得予以肯定。

当然，从康熙帝一生的活动事迹来看，有优点，也必然有缺点。

康熙本人很喜欢自然科学。他曾接近过许多懂得科学技术的西洋天主教传教士，并且从他们那儿学到不少关于天文历算以及技术等知识。他会使用仪器测量水势，还能计算闸口的流量。在三藩战役中命南怀仁制造火器。

他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然而，他却并没有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能掌握科学知识，并制造西洋先进器械的科学技术队伍。康熙从小就信赖祖传弓马惯技，所以他能建立“善扑营”，而不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来建立铸炮厂。他怕广大汉人学会科学技术之后，更加难于控制。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科学水平，是他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在台湾问题解决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4个海关，准许商人载货出洋贸易。当时沿海顿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样一直维持了将近30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重行海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内地人民和海外勾结生事。清朝从入关以来即感到沿海海寇难于扫清；同时当时中国出海贸易的船只，出去的多回来的少，更使得产生疑虑。最后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经由官商，即所谓“十三行”包办起来。闭关的政策会阻碍工商业的扩大发展，这就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挫折。其更加严重的是，从此消息闭塞，最后落得中国挨打。康熙也曾预见到中国未来必有外患，可是并没有作出积极措施。这应当说是康熙的过失。

清朝到康熙后期，已经过六七十年的统治，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内地人民对清朝的仇视情绪渐渐消逝。而康熙于五十二年（1713年）大兴“南山集文字狱”，将年逾花甲的老翰林戴名世处死，甚而还将与之有文字牵涉已经死去的方孝标开棺戮尸，并株连众多。《南山集》案是经康熙亲自处理的，竟如此残忍。

康熙建立皇储一事，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皇子胤 为皇太子，到五十一年又将他废掉，在这将近40年中间，一再废立，直到他临终前未能解决立谁的问题，夺位的斗争即由此而生。康熙有35个儿子，难道找不出一个堪当储位的吗？他晚年多疑，没有能够安排好此事。康熙的这一失误对人民和国家也有消极影响，是康熙的一个很大的失误。

康熙一生确实作过一些有益的事。17、18世纪之际，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加强了，国家的基础比以前巩固了。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费尽心机想要瓜分中国，总未得逞，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康熙一生的努力经营是分不开的。

